



•中国新诗库•
ZHONG GUO XIN SHI KU

第三辑

田

间

卷

周良沛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 国 新 媒 体·
CHINA NEW MEDIA

第三辑

田间卷

周洪宇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 国 新 诗 库
第 三 辑

田 间 卷

周良沛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诗库》 第三辑

田 间 卷

周良沛 编选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30 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3 插页 2 880行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4—0501---0

I. 433 定价：2.10元

卷 首

周良沛

田间(1916. 5——1985. 8. 30)，原名童天鉴。生于安徽无为县开城桥羊山乡。自幼在农村上学，读过《诗经》，又读到郭沫若的新诗，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此后爱好新文学作品。在家乡念完小学，到无锡辅仁中学念初中，一年后又转南京陶行知办的安徽中学学习，又到安徽第七中学读高中。1933年到上海光华大学外语系学习。就在这个时候，胡风眼里一个还未成年的“少年”，“和尚头，圆圆的脸，始终是默默地站在一边；眼色温顺，好象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可信任的事情似的，防备别人甚至观察别人的神色一点也没有。长方形的亭子间里，摆着两张床两个书桌，收拾得非常明净，和我们惯常看到的亭子间风景完全不同，使人得到一个那房间底主人们是抱着纯净的幻想，刚刚离别了母亲来开始人生道路的印象。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少年人正在写诗，叫做田间。”“几个月后，S君交给我几首诗稿，署名正是田间。我读了以后，不禁吃

惊了：这些充满战争气息的，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底新鲜和印象底泛滥的诗，是那个十七八岁的眼色温顺的少年人写出的么？”^①然而，正是这个少年，这个不仅在少年，就是到老年时感情也同样不外露的少年田间，他温顺的外表还是无法挡住内心从小上街抵制日货，“四·一二”后亲眼目睹反动派枪杀革命者激起的波澜，而汹涌在稿笺上。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出版了他第一本诗集《未明集》。结识了胡风、聂绀弩、艾青、蒲风等人。第二年又出版了诗集《中国牧歌》和长诗三部曲《中国农村底故事》。前者，由胡风作序，后者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并搜捕作者。年仅二十一岁的田间，不仅出了三本诗集，而且是反动派为之惊恐的诗集。他参加新诗运动和《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主编《每月诗歌》。1937年春去日本，“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他与在日本认识的郭沫若等同船结伴回国。参加编抗战诗刊《高射炮》。“八·一三”后，茅盾致信邀他去武汉从事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在武汉写出，并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刊出了他那著名的代表作《给战斗者》。这也是后来称之为“七月诗派”的，把田间作为先行的“领唱”之故。后又在西安完成他的长诗《她也要杀人》，成了他创作

① 胡风：《中国牧歌·序》，群众书店1935年版。

的一个高峰期。1938年8月，他随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延安，与柯仲平等发起街头诗运动。有着广泛影响的诗传单《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等，就是这一运动的作品。1940年调晋察冀边区通讯社，到平山境内跟随贺龙参加陈庄歼灭战。1941年晋察冀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他任副主任，并选为边区参议员。出席邓拓等筹办的燕赵诗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他从1943年起深入孟平县游击区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1945年，抗战胜利，调晋察冀边区党委，任《新群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陆续写出组诗《名将录》。长诗《戎冠秀》写出，并在晋察冀日报社出版；《赶车传》写出，当时题为《赶车》，在丁玲、沙可夫、艾青等主办的《长城》发表。1948年冬到石家庄参加华北文艺会，调任张家口市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察哈尔省文联主任。1949年赴北平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调全国文联，任研究室主任，筹备成立中央文学研究所。赴朝鲜战场慰问，第二次以记者身份采访板门店谈判，写出《板门店纪事》。文学研究所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田间任主任。

1954年，《赶车传》由普实克译成捷克文，由民主德国“文字凝练简洁”的“一位文体家”魏斯柯普夫译成德文。据冯至介绍，译者是“写过长篇短篇小

说和在德语文学中有悠久传统的‘轶事’，也翻译外国诗歌”，是“正适宜翻译田间的诗”的学者。译者说田间的诗“象是一面诗的魔镜，里面显映出一个民族的博大的心，战斗的、胜利的新中国的心”^①。魏斯柯普夫对田间诗的翻译和介绍，引起读者普遍的兴趣。

之后，朝鲜也译介了他的诗出版。

之后，他从欧洲到非洲，从祖国的油田到福建前线，从草原的蒙古包到西南的乍佤部落，无论对外出访，还是国内深入生活，都是洋洋洒洒地有诗有文，有的还是大部头。云南一行，就有《长诗三首》。

这期间，1958年在全民“大跃进”，各地展开新民歌运动，作家纷纷下厂进村的时候，他回到自己晋察冀边区的生活根据地，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1965年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77年唐山大地震，他参加了抗震。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停止写作；1975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刊出他的《长城行》，开始重新发表诗作。也是他满六十之际，花甲之年。

① 冯至：《擂鼓和赶车·〈田间〉代序》，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2月版。

再过十年，古稀之际，患骨癌病逝北京。

与他同辈的诗人相比，他也算一位多产的作家。除小说《拍碗图》(又名《宋村纪事》)，散文《板门店纪事》、《欧游札记》出版，作为诗人的诗集，有《未明集》(群众书店，1935，上海)、《中国牧歌》(诗人社，1936，上海)、《中国，农村的故事》(诗人社，1936，上海)、《给战斗者》(希望社《七月诗丛》，桂林南天出版社，1943初版，1954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增订再版本)、《她也要杀人》(海燕书店，1947，上海)、《抗战诗抄》(新华书店，1950，上海)、《誓辞》(新文艺出版社，1953，上海)、《马头琴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北京)、《赶车传》(上下卷合集，作家出版社，1960，北京)、《非洲游记》、《田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北京)，以及《离宫及其它》(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石家庄)等三十余本。还有评论集《海燕颂》、《新中国风赞》。

田间的诗，是“五四”后七十年中诗歌运动中独特的诗的现象。在一度大讲“何其芳现象”时，似乎也可以针对前者而来一个“田间现象”。

从田间的创作历程看，可以说，胡风是知田间者。胡风在他的三卷本《胡风评论集》后记曾道：

……关于他，我只写过三篇短文：一篇序，

一篇回答读者的疑问，一篇后记。再就是发表了她的诗，出版了他的诗集。我因此受到了不断的责难和攻击，抗战后期还收到过联名的恐吓信。但大约同时期，大学教授闻一多站出来发言了，称田间为“擂鼓的诗人”。这甚至成了批评家和诗人们的话题，对我个人的攻击也就消失了。我并没有因此得意，反而发生了感慨：原来，所谓舆论，是这样容易产生、延续、扩大，又是这样容易消失的。①

面对当时别人骂胡风“瞎捧”，以及对田间诗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对说其“淡而无味”，“矫揉造作”，“懦弱浮浅与无力”者，胡风说“是些文字上的滥调，不能成为说明内容的批评”。

时代进展了，文学进展了，今天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田间底身上看出进展或者停滞底痕迹。

我曾说到，诗“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底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对于这个“诗底大路”，田间是“本能

① 《胡风评论集·后记》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地走近了，虽然在他现在的成绩里面还不能说有了大的真实的成功”。为什么只是走近了而已呢？因为，“在他底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因为，他还没有达到“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

从这里，你当可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我没有把田间当作一个完成了的“了不起的诗人”看待；

第二，我没有先从形式上去看田间底创作特性，他的形式（我再斗胆地说一句罢，他底带着天才光芒的形式），正是从他的诗心和生活的结合道路以及结合强度这上面产生的；

第三，我提示他应争取和“对象的完全融合”，在和生活的结合道路以及结合强度上更向前进，这自然也就是在形式上的更向前进。后面我还在消极方面提出了几个应该预防之点。

三年的时光过去了（我写那介绍是一九三六年，到去年《七月》复刊时约三年），全中国卷入了田间在那时候就已沉醉地歌唱着的民族战争里面。

那么，他是否有了进展呢？或者只是停

滞着呢？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是略略有进展，但有的方面，却停滞着，客观上也就是后退了。

什么是和“对象的完全融合”？那就是作者底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底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也就是完整的情绪世界底拥抱。

诗人底思想性和情绪世界，如果是经由这个道路得来的，那将是“了不起”的东西。可惜的是，田间在这个主线上的进展只是偶尔火光一明，全盘地说来，还是停滞在“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上面，那些冲动式的赠诗，以及“史沫德莱，笑了，在中国……”，就是从这里来的。不向这追究，只骂“笑了，在中国……”，为不通的批评家，是不懂得田间，更不懂得诗的。

当然，在战前，他的诗里所充溢的战争与人民（主要是农民）底“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对诗坛有了寄予，对读者有了感兴，但当把生活推进了深刻的变化的战争真正来了以后，这一切都失去声色了。田间虽然还不能从这里大大地前进，但

他的生活却投进了战争，而且发动了“街头诗”运动。什么是“街头诗”？我想，那不外是作者从人民对于政治事变的突发的感应里面把政治动员溶化进去了的鼓动小诗。那么，从田间底创作特性看来，他对于这一运动的热心和这一运动在北方战地的开展，就不难得到理解了。再让我斗胆说一句罢，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底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他在这一工作里面有使他的生命发展的可能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田间还是一个没有完成自己的诗人（我们已有了多少完成了他们自己的诗人呢？），最不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诗人，如果他不能获得向生活深处把握的力量，也就是把握生活底思想性和拥抱情绪世界的力量，那他就会在感觉世界里面四分五裂，终于溃败而已。现在，一方面是批评家底蒙头不着脑的打击，一方面是编辑先生底交际办法（田间最喜欢发表或出书，但他的诗十首里面只有二三首可以介绍给读者），这都是需要他自己深加警惕的。

从上面的分析出发，对于先生底意见可以提出一点回答了。

先生说他的形式是“固定的不灵活的形

式”，而不是“自然的形式”，但我以为恰恰相反，那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内容问题，他的形式最不“固定”且过于“灵活”，原因是，他的感觉和情绪，还只是在生活对象上面跳动的。如果“不自然的形式”指的是没有反映出情绪底自然的流，那是可以的，虽然问题似乎还应进到内容方面去。

比起闻一多先生，胡风几乎是属于当代说的，是以“超前意识”肯定了田间，也批评了田间。那也是田间“初出茅庐”之际，他的《未明集》虽然同样是写“战争下的田野，田野上的战争”，但那在“凄苦的月色”，“从寂寞的悲哀里也作挣扎的呻吟”的，垂死的战马，那夜守出征的儿子的母亲，那“在苦难的摇篮里颠跌老了”的岁月，都是忧郁的。作者是愁于见它们，又无奈于它。于是，对他之所见，也只有以忧郁之色，出于无奈而作平实的呈述。那是在中国大地四处都同样发生的故事，作者也是用诗行让我们象惯常看到的这些景象一样再看一看它。其写实的魅力，是颇强的。但是，作为田间后来引人注目的，那真正使人耳目一新的形式、诗风，其《中国牧歌》才是他形成这一诗风的过渡。诗集中被题作书名的《中国牧歌》之“牧歌”，就不是真正的田园牧歌：“忏悔的眼泪/流息了/丧钟哑默在大地上/

羊/一千个，一百个/暗杀在小房”，这完全是控诉血腥的屠杀。这诗，不是作者能够完全“拥抱了的境地”，待完善之处也多，但是，作者再不是无奈的。随着作者情绪的跳动，其感觉、意象、时空的跳动，已经看到《中国，农村底故事》的思想和艺术的酵母。这部称之为“三部曲”的长诗，其中多次出现“在中国谁是自由和快乐的”的问句，这使人很容易想到田间在日本接触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 (H·A·Некрасов 1821—1877) 名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那是富有民歌色彩，反映农奴制改革前后农奴主残酷压迫，农民贫困悲惨的生活的巨著。可是，田间的“农村底故事”是没有故事的故事，也无情节，更没有民歌色彩，只是感觉、情绪的奔流，有时闪光，有时泛滥。作者深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是在这三部曲之后，然而，对养育了自己的乡村的感情，从《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很自然引发了他对“在中国谁是自由和快乐的”思索，这是史诗的命题，作者有热情，却毕竟生活阅历不深，又不象《未明集》就是以自己一些实际感受写点生活片断和场景，于是，主体意识在不能与其表现对象的客体契合时，结果，作品自然气魄雄浑有余，支离破碎得可以。

1942年，当闻一多评介田间时，田间已不是写《中国，农村的故事》时的田间，闻一多也不是写唯

美的诗篇的闻一多。田间变了，闻一多更变了，两位从完全不同的起点出发的诗人，由于都在变，而找到一个契合点。

田间虽然总还是田间，又有一个新的面貌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确实如闻一多所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多么有斤两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音’……那一套，你的耳朵太细了。”① 闻先生本人就是由一位“耳朵太细”的唯美诗人，在全民抗战的烈火中也壮实得习惯和喜欢这震耳的鼓声了。它与全民同仇

①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闻一多全集》卷三，开明书店1948年版。

敌忾，待征催战的心声是雄浑的交响。不打仗，就作奴隶，别无选择；太尖锐的问题，太深刻的警世之言，太简单明白不过，又太沉重的真理！他那“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在他的长诗里，虽然还有读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毫不选择的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截成数段来安排”，但是——

噢……

噢……

噢……

是谁杀了
我底儿，

我底儿
是谁杀了，

我……

我……

我要明白！

.....

这里，有的还是不成句的字，词，节奏短促的截断处，都在延续情绪要爆破的张力，为内容的需要确